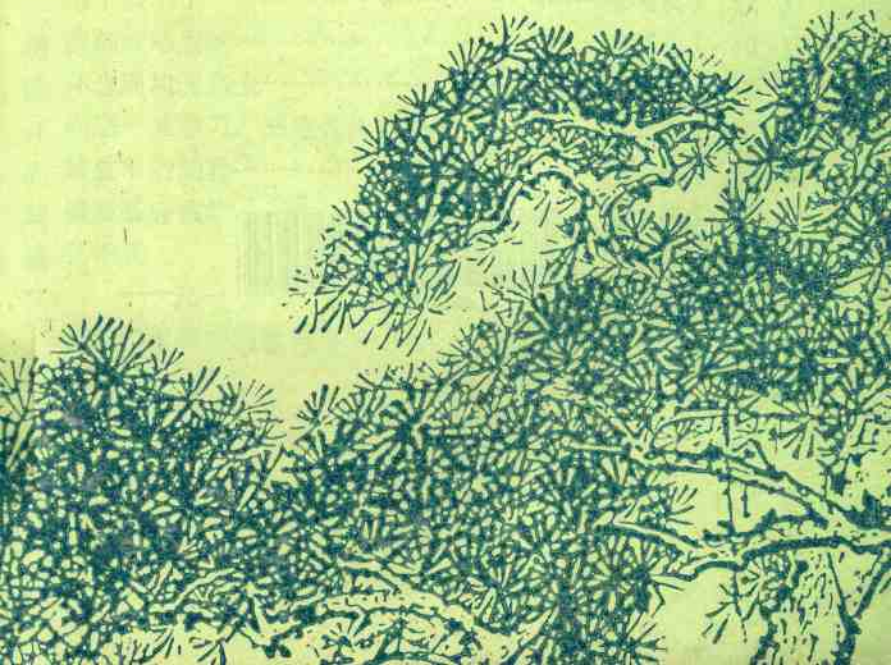


献给杭州解放四十周年

学员回忆录选

第二辑

杭州老丰大学



目 录

解放杭州记略·····	王明新 (1)
我们的心声·····	齐 绪 (4)
长征路上雪山行·····	邹方迪 (6)
回忆解放初期三墩的剿匪斗争·····	朱怀兴 (12)
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	
——战地服务日记摘抄·····	边亚华 (17)
从一部《资本论》引起的回忆·····	徐大雄 (27)
会稽山人民游击抗暴司令部 ·····	
斤头联络站始末·····	杨水镜 (30)
两个假小子·····	张书农 (37)
我的戎马生活·····	李革非 (40)
怀念周旭光烈士·····	鲁 明 (42)
向老一辈学习, 坚定人生道路·····	胡鸿钧 (45)
解放前后的我·····	孔庆廉 (51)
镇海县府被炸·····	徐学镛 (56)
花棉袄	
——记一·····	梁佩佩 (59)
朝鲜碧潼战俘营散记·····	余 虹 (62)

解放杭州记略

王明新

在庆祝杭州解放四十周年的盛大节日里，作为原23军在杭的老战士，当年参加过解放杭州的战斗，感到格外激动。现写几个战斗片断作为献礼。

军令如山 直指杭州

1949年4月30日，我军全部扫清了杭州外围之敌，打算在湖州、德清、孝丰一线稍作休整后再向杭州挺进。突然接到总前委急电，命我军火速前进，务必于5月3日午前强占杭州，控制钱江大桥……。军令如山，军部立即决定军侦察营与69师为先头部队，67师与68师为第二梯队随后跟进。部队接到解放杭州的命令，欣喜若狂，什么疲劳、脚痛都抛到九霄云外，队伍像钱江之潮汹涌向前。五月二日陶勇军长亲率侦察营与先头部队赶到瓶窑，杭州在望，大家恨不得一脚踏入“天堂”，可是运河挡住了去路，部队被迫停了下来。当然，军令如山，部队迅速用小船、门板架起了浮桥，陶军长命令部队跑步前进，并高声发令：“谁停止不前，就要执行纪律。”此时此刻，指战员们只想着一个“快”，想一口气冲进杭州城。

果然，队伍进军非常神速。我们沿着运河两岸，顺着湖墅古道，越过城防工事，挺进武林门，与兄弟部队廿一军几乎同时在五月三日早晨进占了杭州。

部队进入市区，敌军已狼狈逃跑。陶军长按预定计划，派一部分部队快速向大桥扑去，我军和廿一军一起，分别进占电台、报社及国民党省、市政府和一切要害部门，从此，杭州回到人民手中。

加强治安 恢复秩序

杭州刚一解放，廿一军奉命继续南进解放浙南。总前委命廿三军建立杭州警备司令部，军长陶勇兼任警备司令。

但正当全城人民欢庆杭州新生之际，街头一下子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武装队伍，他们声称要配合解放军行动，有的还装模作样抓捕国民党散兵游勇。一到晚间，清波门、九里松、宝石山一带时有冷枪，还打信号弹，甚至拦路抢劫，行凶绑票；同时谣言四起，弄得人心惶惶。一天，侦察参谋向军长报告：在城站西南方向有一支自称是李济琛的部队，有100余人。当查明它是冒牌货时，军长立即命令李海波 参谋带警卫连包围了这个“司令部”。这位“司令”叫黄炎，矮胖个子，秃顶大脑袋，骨溜溜的小眼睛直盯着李参谋。“奉军长的命令，来收缴你们的武器，队伍必须立刻解散”，李海波以命令口气说。那位“司令”满脸堆笑，进行狡辩：

“不要误会，自家人，……”李海波耐着性子听完他的陈述后，义正词严地指出：“我们陶军长说过，只有解放军才能有枪杆子；不管你是什么部队，一律先缴枪，违者以抗拒论处。今后如果查明确曾为解放事业做过好事，再作研究。”这个矮胖黄炎理屈词穷，自知不可抗拒，只好乖乖缴枪。只化了两三天时间，城内外那些公开打出旗号的冒牌武装，除少数窜入富阳、桐庐山区外，全部一千余人都会被我们缴了枪。

为了建立社会秩序，恢复生产，稳定人心，警备司令部还派出大批干部取缔喧闹一时的银元贩子；并从全军保卫部门中挑选出一批优秀干部，充实公安军管会。经过他们日夜艰苦奋战，终于挖出潜伏得很深的一伙敌特，在松木场公开宣判处决，大快人心。自此，杭州平静了，生产逐渐恢复，市场日益热闹，人民喜笑颜开。二十三军在杭州解放初期为维护社会治安作出了贡献，受到了上级的表扬。

我们的心声

齐 绪

我们不懂憬永生，也不奢求自己的足音能回响多少个世纪。人离退休了，但心依然得工作。为的是在余下的日子里活得有意义，不空虚，对社会，对下一代能继续有所贡献——那怕只一点点。想到年轻人或许能从我们走过的道路中吸取一些什么，以利于他们的成长，那就更是一种欣慰——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来写回忆录的，并把它作为献给杭州解放四十周年的一份小小的礼品。

我们这些人，北越太行，南饮长江，餐风沐雨，几度春秋，为革命事业奔波了大半辈子，没学过多少文化，于文学和写作多半是外行，过去在戎马倥偬中所学的，也只是识了几个字而已。因此要动手写回忆录，困难真还不少。现在印出来的这些文章，没有华丽的文采，有的只是真实、朴素的记录。它将告诉你，文章的主人公是怎样在天与地的焊接处寻找火花，怎样渴望自己的人生波澜壮阔的。他们中，有冒九死一生与敌人进行斗争的；有在战火纷飞之中，肩背红十字箱救死扶伤的；有在经济战线上呕心沥血，表现了真正共产党员风骨的；还有为了和平的事业，不辞辛劳的……文字或许粗糙，但感情绝对真挚，因为这些文章不是用一般的笔墨写成的，而是用我们一生的爱和恨，欢乐和诅咒，眼泪和热血写成的。假如有一天“天国点到了我们的名字”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个世界里得到了延续。

无论是花是草还是大树，都离不开养育它们的土壤。文学也是。我们要感谢党给予了我们幸福的晚年，还要感谢杭州老年大学这块供给我们水份与营养的土壤。如果没有它，我们或许不会拿起自己的笔，也不会活得象现在这么健康、舒畅。

上了年纪，难免跟不上时下的潮流，又可能为人事和时间所囿而产生某些片面性，文法和修辞更谈不上精确、讲究。但如果想到这些文字是我们用昏花老眼、用痉挛的手一个一个地抠出来的，大概读者就不会对它求全责备了。尽管这样，我们还是希望能听到真诚、中肯的意见。

一九八九年二月

长征路上雪山行

邹方迪

一九三五年六月初，我们三军团所属的五师紧跟一军团，迅雷不及掩耳地占领了四川省的天全、芦花。

当天晚上，我们连以上干部听了动员，要大家做好翻越夹金山的准备工作。会上，五师师长彭雪枫同志宣读了中央军委发布的命令，要我们跟随一军团的所属部队迅速北上翻越夹金山，夺取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合。接着我们就离天全，到了宝兴。这里的地势已经很高，峡谷也特别多，远远就可看到高耸入云的大雪山。六月十三日，我们进到宝兴县的大跷碛，这里已是夹金山的脚下，长征中最艰难的行军开始了。

夹金山主峰海拔为四千五百多公尺，山上空气稀薄，天气变幻无常。我们从贵州、云南进入四川时是炎热的夏天，穿的都是单军衣，爬雪山了，只有把背包打开，将毯子披在身上。这儿的天气，说变就变。上午晴空万里，一过中午，大雾弥漫，然后，又是毛毛细雨，转眼就大雪纷飞。我们呼吸异常困难，不能讲话，只能闷着头走，也不能停下休息。我们不顾严寒的威逼和行军的疲惫，互相帮助照顾，克服重重困难，胜利地度过了第一关。当我们翻越夹金山到达大维，看到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二十五师战斗部队时，个个脸上露出喜悦的神情。

大维是藏民集居的地方，建筑物风格与汉人迥异，最高

的要算喇嘛庙，达十余层。民房多用石块砌成，屋顶盖的也是石板，室内都有经文，壁上挂着佛象；生活方面也同汉民不一样，每天吃的是青稞面、玉米、牛肉、羊肉、牛油、牛奶、穿的是喇嘛袍子，与内地的和尚袍很相似，鞋子象京戏里武生登台的官靴，男人都佩刀子。

大维与懋功相距八十里。在大维休息了一天，就向懋功开拔。懋功是藏民地区一个较大的市镇，有居民三四百户，有六十多家店铺，街上还有做买卖的汉人。藏民中，也有懂汉语的。此地还有一所大天主堂。当晚我们参加了四方面军干部联欢会，各部队都组织文娱节目上台演出，我们三军团的文艺工作者也上台表演舞蹈，这使我们很快解除了疲劳。在懋功休息了四天后，部队即向河口卓克基进发。在行军中，困难一天天增加，食盐、粮食的供给都成了问题。藏民因为受到国民党的欺骗宣传，大多数都躲藏起来。我们一天只能吃一顿青稞麦，将两天的粮食分作四天吃，在这样的艰难中我们到了两河口。在两河口，彭雪枫同志又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，红军主力要向北进攻，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，以争取中国西部各省以至中国的胜利。我们受到极大鼓舞。当时也听到有人反对，到了陕北后，我们才知道反对中央决定的就是张国焘。

从两河口至卓克基有一百二十里，中间横着一座大山，萝笔山，山的高度和夹金山差不多，这里的地形险恶，山上一年到头都有几尺甚至一丈多厚的积雪。山上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，高大的古柏直耸云霄，仰头不见天，下雨不撑伞。此地河流溪涧纵横交错，行军困难可想而知。但少数藏民因受欺骗而向我们放冷枪，更使我们困难重重。当进入萝笔山山脚，准备登山的时候，随同我们后续部队行军的团参谋长吴

瑞同志接到上级的指示，要求后续部队负责收容掉队的同志，对牺牲的同志，要把他们尸体掩埋好。这样行军和收容的双重任务，就负在我们肩上。这萝笔山，山陡路滑，有的同志被冰划破了腿，淌着鲜血；有的同志脚陷到雪里，鞋子找不到，只好光着脚，忍着痛往上爬；有的踏在冰上，没有踩稳脚根，滑到路下面的溪地里，几个人再手拉手，把他拖上来；有的身体比较弱支撑不住，身体强的同志就背他上山。当我们正一步一步向山上攀登时，忽然上面有一个东西滚下来，我们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位掉队的红军战士。扶起来后，见他紧闭着眼睛，脸上淌着血，但心口还有一点热气。我们连忙把被单给他盖上，过了二十来分钟，那位同志慢慢地睁开眼睛，后来嘴也张开了，就是说不出话，我们想，他可能是饿极了。我让一班长掏出一块干粮，塞到他嘴里又喂他冰块。他很快地支撑着身子站起来，和我们一起往山上攀登。到了山顶，已经是黄昏。这里空气稀薄，呼吸困难，有的挣扎着站起来，又倒下去。

从卓克基经梭么到马塘，大约一百六十余里，中间没有大山，但河流很多，有时骡马中途遇到河水涨就不肯进，就耽误后继部队前行，要等到水退了以后，才能涉水前进。

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行军时，红军总司令部临时设在这里，毛泽东主席、朱德总司令就曾在此办过公。在梭么住过两天后向马塘移动，化了半天时间，下午到达马塘。该地是懋功通理县、汶川的大道，北走可到通藩，地势极为险要，但住户不多，只有几家小店铺，还有一所是过去的关卡，是用来收税的，所以我们都在郊外露营。我们在月光下一边唱歌一边讲故事，说笑话，把几天行军疲劳忘得干干净净。但是这几天的天气真怪，当我们进入梦乡时，狂风大

作，大家的衣服、被褥、毛毯全部弄湿，一夜不能睡觉。

我们在马塘休息一天，晒干衣服和背包。第三天一清早，就开始爬山。这座山叫括上山，从山下至山上的行程为五十里，是我们雪山行军的第三座，这山与夹金山的空气一样稀薄，地上异常潮湿，所不同的是每天刮大风，不仅有雨雪，而且还有冰雹。过了两座大山，我们也有经验，都学会腾起一点身子放平两只脚轻轻地从雪上走过，陷到雪里去的就很少。当然先头部队的战友还是有的，在途中遇到一个掉队的，我们立即把他带上。上山的时候，我后面一个云南籍的同志额头直流着汗，脸色铁青，看样子要想坐下来休息，经验告诉我们，过雪山千万不能停下，一坐下自己就一时站不起来，时间一长，就会送命。连队王指导员见到后，连忙一个箭步走过去，把他的手架在自己肩上，鼓励他，坚持下去。这样扶的扶，背的背，在下午三点终于到达山顶。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，一霎间西南方向一大片黑云迅速向我们上空移动过来，接着暴风雨挟着冰雹，劈头盖脑向我们打来。此时，我们立即移到山顶的一棵树旁用背包顶在头上，避过冰雹，又是鹅毛大雪，又是凛冽的寒风，冷得我们颤抖不停。披在身上的被单，被风吹得鼓起来，象船上的帆蓬。我们仍马不停蹄地走下山来。这时，一个战士下山时一个疏忽，身子一滑，被滑下十余丈远。大家正在焦急万分，他却高兴地在山下大喊：“同志们，快滑下来吧，这里是斜坡，很安全”，于是我们都蹲下身子，滑下了山。

我们在马河坝休息了二天，先头部队来电，说他们已抵达格则、黑水、芦花，在那里收割青稞麦，筹集行军的粮草，要我们迅速到达格则。我们沿着河边的羊肠小道走，水流湍急，波涛滚滚。这里地势险峻，上面是削壁，望下看是

万丈深渊，途中有的地方只能容一个人侧身而过，先头部队许多骡马就在此地跌死。走了四十里，下午就到达格则。我们一面收割青稞麦，一面通过通司，把藏民找回来，付给了钱。所以这儿的藏民没有象初进雪山那样阻挠我们。

在格则、黑水、芦花休息了几天，备足了行军的粮食，继续向打鼓进军。从格则到打鼓，行程共一百三十里，中间也有一座大山叫打鼓山。这座山比夹金山大，从这边山脚下到山顶就有六十里。因为已经翻过三座雪山，大家对这里的气候比较适应，再加上都有爬山的经验，先头部队的人很少，我们的收容任务，也就减轻些，而且我们还创造了坐滑梯的经验，第二天的下午，我们就到达打鼓。打鼓共有上、中、下打鼓三个村庄，居民约有一百余家，在藏民地区也数得上是个大村庄，村里的人都逃散了。这里地势比较高，青稞麦还正在开始灌浆，整个田野里呈现一片青绿色。白天我们都跑到村外的田野，挖野菜和青稞麦煮在一起，吃起来实在难以下咽。一天，我在田野弄到一些嫩豌豆，放上一点盐，这味道美极了。

从打鼓到毛儿盖也有一百余里。中间有一座雪山叫腊子山。这里是雪山行军中第五座大山，也是最后一座山。从山下到山顶也有五十里。我们从打鼓出发时，先头部队已到达毛儿盖。这里是松潘县管辖的，驻扎着国民党胡宗南部一个营，因为不肯和红军一致抗日，而且还向我一军团进攻，结果被我三十军和二师四团击溃了，还缴获了不少武器。打鼓山虽然比较高，但道路比较宽阔，空气也比以前经过的几座大山要好，我们在行军中唱着歌，有时又说笑话，讲讲故事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战士跑上来告诉我，莫营长病倒了，我心中一怔，连忙走上前去，只见他脸色苍白，两眼紧

闭，当我大声喊他时，他慢慢睁开眼睛，轻轻地对我说：“我不中用了，别管我，抗日要紧，你们前进吧。”话音刚落，就闭上眼睛倒了下去了。莫营长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，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，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，他的音容笑貌直到今天还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。

当天在沙窝宿营，次日到达毛儿盖。这是藏族地区最大的村庄，土地肥沃，据说一年收成，可以吃二年至三年。当我们到达毛儿盖时，当地许多居民陆续回到家里，我们割了麦，通司给我们找到土地的主人，向他们付麦子的钱。雪山行军就此告一段落。此行计日三十一天，路程有二千七百里左右。

一九八八年六月十一日

（邹方迪同志，亲历长征，在八十二岁高龄时，亲笔写了这篇回忆文章，倍感珍贵）

回忆解放初期三墩的剿匪斗争

朱怀兴

“钟山风雨起苍黄，百万雄师过大江”。一九四九年，五月三日，我华东野战军一举攻克杭州，所属杭县（即现在的余杭县）同时宣告解放。

为了迅速打开杭县的局面，上级委派一批南下同志分赴各地担任领导职务。当时我被任命为杭县三墩区区长，陈万贵同志为副区长，张继忠、李广新同志分别被任命为正、副书记，同时被任命的还有民运委员范玉山，组织委员肖学伦，宣传委员孔凡坤，粮库主任孔凡桂等同志。当时的三墩区，除现在的余杭县三墩区外，尚包括现在杭州西湖区的古荡、留下、龙坞、上塘河、祥符桥在内的几十个村镇。这里地理环境优越，河湖港叉星罗棋布，竹林郁密，桑园成片，一派江南风光。三墩镇是该区的政治经济中心。华东野战军军事管制委员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：接管伪政权，收缴枪枝弹药，为继续南下的大军筹集粮食，发动群众，建立乡人民政权。我们一到三墩，便很快跑遍了所属的乡村，访贫问苦，学习当地语言，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，同时也接触原国民党政府的中下层人物，讲明政策，要他们奉公守法，服从政府命令，上缴所有武器。

在当时的胜利形势下，杭县一带的地方反动分子改变手法，和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土匪相勾结，成立地下伪政权，与我新成立的人民政府抗衡，企图东山再起，恢复他们的天

下。土匪司令何作权纠集地方反动势力，成立了地下县政府和土匪武装，自任地下伪县长和土匪司令。三墩境内，山桥乡以土匪大队长伪乡长王锡连，双桥乡以土匪中队长、伪乡长藤贵根，蒋村、邱桥、留下一带以伪区长、土匪大队长蒋天相为头目的几股土匪，有三、四百人之众。他们见我南下干部人数不多，语言不通，群众对我共产党了解不深，公然进行反革命宣传，说什么“共产党、解放军住不长，国民党蒋介石半年就要回来。”威胁群众不准与我们接触，不准给解放军送粮，违者杀头。这股土匪还经常在大白天出动数十、上百人在大街上扰乱社会治安，抢夺群众财物，抓捕拷打与我接近的群众，气焰十分嚣张。另一方面，一些尚未暴露土匪身份的保、甲长伪装老实，利用与我们接触的机会，刺探情报，寻找机会谋杀我干部。记得四九年六月十五日，我和陈万贵、范玉山、孔凡温及通讯员张锡敏等同志去蒋村，傍晚有事我要返回区政府，原伪乡长蒋天相假意用船送我。一上船，发现划船的是两个农民模样的男人，而当地习惯以女人划船为多，事有蹊跷，我预感到途中可能出事，便临时改变主意（后来蒋天相被我俘获，从其交待中证实，那天他们正准备途中将我杀害）。第二天离开蒋村前，我与陈、范两同志研究分析，对蒋要提防，同时决定十八日召开伪乡保甲长会议，进一步向他们交待党的政策，责令他们要老老实实，配合我们筹粮支前工作。这时的蒋天相名为伪乡长，实为地下伪区长兼土匪大队长，对他的反动面目，我们一时还尚未摸清。狡猾的蒋天相一面与我们敷衍周旋，通知保甲长开会（其实保甲长均已加入土匪武装成为大小头目），一面暗中布置土匪一百余人，乔装成农民，潜伏在会场、茶馆、店内及附近地方。会议开始前，他们设下圈套派人上楼送假

情报，把陈万贵同志拖住在会场楼上，又把范玉山同志骗去茶馆。当范玉山同志一进入他们的伏击圈时，一声枪响，两处同时发起突然袭击，频频向陈、范两同志开枪，陈万贵、范玉山两同志英勇搏斗，终因寡不敌众，壮烈牺牲。

烈士的鲜血进一步清醒了我们的头脑，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，不肃清匪患，就无法打开工作局面。根据上级的部署，区党委决定由我负责剿匪工作，并把原来分散在各乡的二十余名干部集中在双桥、肇和、留下三个点上，以防再次发生不测事件。六月底，华东野战军第七兵团三一四团，由参谋栾尚高同志带队，派驻一个连协助我区武装一起发动群众，开展剿匪斗争。

三墩是新解放区，长期以来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和恫吓，当地群众一时还不敢向我们讲真话，但我们深信，只要我们深入群众，用实际行动表明肃清土匪的决心，群众一定会很快发动起来。我们深入到受苦多、仇恨深的农民家中为他们做好事、和他们拉家常，逐渐打消了群众的顾虑。如后来曾担任三墩区委书记、区长的李寿根同志，解放前，父子二人给一恶霸地主做长工，深受剥削和压迫，经我们一启发，很快提高了觉悟，成了剿匪斗争的积极分子，面对土匪的威胁毫无惧色。他父亲领着儿子李寿根，来到区委对我说：“我看清了，你们是为我们贫苦农民做事的，我把儿子交给你们，让他一起去打土匪。”就这样，李寿根同志参加了革命。在他的带动下，群众骨干队伍很快就形成了。这些骨干土生土长，情况熟悉，了解土匪的行踪，为剿匪工作的开展，作了重要贡献。蒋村一带的土匪，在陈万贵、范玉山两同志牺牲以后，害怕我们会反击，就改变活动方式，龟缩在竹林深处的几间小屋子里，竹林外围是四通八达的水网，地

形隐蔽，能攻能守又能溜。这帮匪徒喝足吃饱后，白天睡大觉，夜间出来骚扰。他们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加上南下干部战士不善划船游泳，我们几次出动都未获得成功。骨干队伍形成以后，根据他们提供的具体情报，我们制订了严密的战斗计划。四九年七、八月间，我区武装在解放军的配合下，对山桥、双桥、蒋村一带的土匪组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围剿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。除击毙部分匪徒外，俘获六十余人，匪首藤桂根、吴龙喜、孙阿维等被生擒，缴获了包括机枪在内的一大批武器弹药，并救出了被土匪关押的二十余名群众。

剿匪斗争的初步胜利，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，同时也狠狠地打击了匪徒们的嚣张气焰，他们孤立无援，士气开始低落。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出布告，讲明党的政策，限令残匪在指定时间、地点缴械投降。八月，土匪中队长徐培生、郭阿甫、陈文玉、盛寿根等十多人，带着残部，到我们指定的调露庙、留下、蒋村先后缴械投降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匪徒们心惊肉跳，惶恐不安，我们又进一步采取政治攻势，贯彻执行“首恶必办，胁从不问”的政策，有效地瓦解了土匪，打击了敌人。八月十六日，在双桥乡，我们召开了有三万多人参加的全县第一次公审大会。广大群众纷纷上台控诉了土匪恶霸的罪行，对罪大恶极的藤贵根、吴龙喜、孙阿维等土匪头子就地镇压。这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斗志，震慑了敌人。

骨干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，我们乘大好形势，彻底废除保甲制度，建立了乡、村一级人民政权，成立了农民协会和村自卫团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残余土匪深感末日来临，一遇到自卫团、一听到南下干部的北方口音就惊慌不已。陆续投降